

情况特别是民族解放的情况，革命思想进一步受到洗礼，更加坚定了跟党走革命信念。

相信同志，团结朋友，才能更好地孤立和打击敌人

按照李大钊的要求，中共北方地区党组织在这批蒙古族青年学生中加强理论教育的同时，还注重加强他们的实践锻炼，尽量多动员组织他们参加党领导的一系列北京革命运动。1924年至1925年，这批蒙古族青年学生先后参加过纪念二七惨案一周年大会、纪念列宁逝世一周年大会、支持孙中山北上促成国民会议运动、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等，成为当时北京革命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

为了保证北京革命运动在党的领导下正确开展，李大钊要求参加的每一个党团员都要坚决贯彻执行党的革命策略做好工作，这些蒙古族青年学生参与其中也深受教育。乌兰夫当时是参加北京革命运动的积极分子，他多次被党组织安排做好相关的服务工作，工作很认真。一次，组织上安排乌兰夫和蒙藏学校另外2名党团员担任纪念列宁逝世一周年大会会场的把门检票工作，不料发生了贸然挡住苏联驻华大使入场的误会。李大钊知道此事后，专门派人来蒙藏学校给乌兰夫等人讲了党的革命策略问题，指出要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看问题，要相信同志，团结朋友，才能更好地孤立和打击敌人。他们听了以后，思想豁然开朗。

1925年，李大钊根据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指示，负责指导组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加快推动内蒙古地区民族革命运动。他特地从蒙藏学校选择了一批蒙古族学生党员参与筹备工作，特别指示他们要坚决贯彻党的革命策略，并要求吉雅泰、李裕智发挥带头作用。一次吉雅泰到李大钊家里请示一些成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问题，李大钊着重就革命策略问题作出指示，要他们参加这个组织，要在组织内发挥自己的战斗作用，多做实际的群众工作，努力发展和团结一切的进步势力。他们坚决贯彻李大钊的指示要求，积极争取左派代表和青年代表的支持，吉雅泰、李裕智还当选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内蒙古的革命烈火又被点燃起来

面对蒙藏学校这批刚走上革命道路的血气方刚的蒙古族青年学生，李大钊希望他们不管革命遇到什么困难都能把旺盛的革命斗志保持下去，有力地鼓舞着他们的革命斗志。

1925年春，李大钊主持召开蒙、绥、热、察党的代表会议，决定建立中共热河、察哈尔、绥远特别区和包头4个工委，其中分配李裕智担任中共包头工委书记。会后，李大钊拍着李裕智的肩头语重心长地说：责任重大啊！你们并不孤立，有党，有蒙汉各民族的劳苦大众，有了这两条，加上我们的努力工作，局面很快就会打开。李裕智没有辜负李大钊的期望和鼓励，英勇地担起责任，只身来到包头开辟党的工作，当年冬天就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和内蒙古地区第一个工会组织，并发动和领导了内蒙古历史上第一次煤矿工人大罢工。李裕智一直保持高昂的革命斗志，勇往直前尽心竭力在内蒙古地区开展党的工作直至1927年10月牺牲。

1925年下半年至1926年间，随着革命形势发展，蒙藏学校蒙古族青年学生被中共北方区党组织分批选送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党务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和黄埔军校进行专业训练。每批临行前，李大钊都会指示组织派人去做告别谈话或亲自谈话，勉励他们努力学习，保持革命斗志，学成归来后迅速投身内蒙古地区革命。1925年10月，组织决定乌兰夫等5位蒙藏学校蒙古族青年党员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临行前他们受到了李大钊的约见。李大钊勉励他们锲而不舍地学习革命理论和革命经验，并与他们一一握手告别，预祝他们满载而归。

这些蒙古族青年不辜负李大钊和党组织的关怀、勉励，勤奋学习，心中始终燃烧着革命的激情，学成后他们接受党组织安排迅速投身国内革命。1926年秋，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的一批蒙藏学校蒙古族青年回到各自的家乡，投身到正在兴起的内蒙古地区农民运动高潮之中。1929年9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校工作的乌兰夫毅然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很快就在土默川站住脚，扎下根，把被敌人扑灭了的内蒙古革命烈火又点燃起来。

创造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历史奇迹

——西藏和平解放纪念碑碑文敬读

□ 孙向军

和平解放开启了西藏历史的新纪元

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近代以来，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于国家羸弱，西方帝国主义的势力开始染指渗透西藏并罪恶图谋“西藏独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根据西藏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决定采取和平解放的方针。1950年10月人民解放军解放昌都。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就西藏和平解放的一系列问题达成协议，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宣告西藏和平解放，西藏历史从此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和平解放使西藏彻底摆脱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其政治、经济羁绊，维护了中国的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实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和西藏内部的团结，为西藏与全国一起共同进步和发展创造了基本前提。

和平解放以来西藏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

以和平解放为开端，西藏走过了波澜壮阔的70年，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旧西藏处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统治之下，这种制度粗暴践踏人类尊严，严重侵犯基本人权，根本阻碍西藏社会发展，完全背离中国和世界进步潮流。西藏上层统治集团的一些人企图永远保留封建农奴制，并在1959年3月发动全面武装叛乱。中央人民政府在平息叛乱的同时，在西藏开展民主改革运动，废除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实现政教分离，从根本上改变了西藏旧的社会制度，并为西藏自治区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及其人民政府宣告成立，西藏开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通过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之后，西藏在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里，历经社会主义建设、改



革开放和新时代，实现了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历史奇迹，实现了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专制走向民主、从封闭走向开放的伟大飞跃。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西藏工作，把西藏工作放在党和国家战略全局中进行谋划，提出了“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战略思想，主持召开中央第六、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围绕西藏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西藏工作取得了全方位进步和历史性成就，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作出重要贡献。2020年，西藏和全国其他省区一道，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如今，西藏社会大局持续稳定、经济文化繁荣发展、宗教寺庙和谐和顺、生态环境良好、人民生活幸福安康，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正日益呈现在世人面前。

和平解放70年历史的深刻启示

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西藏实现长治久安和长足发展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和平解放70年历史雄辩地表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新西藏，党中央关于西藏工作的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没有党的坚强领导，西藏发展的战略目标也难以实现。党的领导是西藏治理的本质特征和根本保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显著优势的发挥，是西藏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西藏的繁荣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显著优势发挥的生动体现。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保证了西藏工作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坚持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聚全党全国之力支持西藏发展，保证西藏与全国的同步发展。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加强了民族团结；坚持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政治制度，保证了西藏各族人民当家作主并实现各项自治权利。

坚持并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才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西藏工作中的集中体现，是对中国共产党治藏稳藏兴藏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党的治藏方略的最新发展。这一方略是做好新时代西藏工作的纲和魂，为西藏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必须长期坚持并全面深入贯彻落实。

为了新中国——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第二，坚持实事求是。对于国际传播工作，毛泽东强调，一定要实事求是地宣传我们党的政策，尽力既让他们了解我们工作中的优点和成绩，也了解我们的缺点和不足。周恩来也提出，“切不可搞浮夸，更不可弄虚作假”。“敞开大门”是延安时期接待工作的一条重要原则，“在谈到延安政府的缺点时，态度上一点也没有东方人的自卑感”。中共的自信态度和开放胸襟给外国记者留下深刻印象，取得了良好外宣成效。

第三，善用外媒力量。国际友人、报刊记者、美军观察组等，或通过报道，或通过著书，或通过报告，将中共的实际情况传递到国外，这对我党塑造国际形象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用朴实的叙述、鲜活的文字、生动的事例，向外界展示了一个立体的、真实的中共形象，赢得了各界人士的支持，认定“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第四，用事实说话。在抗战期间，国际上对中国共产党的关注度逐步提高，他们都想看一看中共领导的军队在游击区能不能坚持到最后的胜利、中共所实施的政策是否侵犯各国的利益。因此，党中央强调，我们要用实际行动给敌人看、给全国全世界看，用事实证明游击战争在中国的自卫抗战中是能够发展的。

党在延安时期的对外宣传

□ 杨云成

延安时期，面对国民党的封锁、诋毁、污蔑，我们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的策略，开展了一系列对外宣传和国际交往活动，摆脱了舆论困境，赢得了各界人士支持。其中所秉持的理念、建立的机制、采取的措施，对于在国际上传播中国共产党的声音发挥了重要作用。

“走出去”：全方位宣传中共的理念和抗战主张。党中央到达陕北后，非常重视对外联系工作，提出要打破“左”的教条束缚，执行“灵活的外交政策”，要把“加紧国外宣传”作为一项紧急任务。首先，成立宣传机构。1938年，在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等学校挑选与海外有社会关系的优秀学生和进步青年组成海外工作团；1938年4月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了国际宣传委员会，并设立办事机构——国际宣传组；1940年10月中央宣传部成立了国际宣传委员会；等等。这些对外机构在传递中国声音、宣传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事迹和根据地的经济社会情况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次，翻译、出版著作。在周恩来领导下，先后将《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数十篇著作译成外文发表，在海外产生了很大影响。与此同时，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协助进步团体和进步人士，也将毛泽东的著作在港编译出版。再次，发行报刊，建立电台。在纽约创刊的《先锋周报》1934年改版为《先锋报》，立足美国社会下层的劳工华侨，宣传中共抗日主张。为扩大国际

影响，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创办了在海外从事救国宣传的机关报《救国时报》，虽然存续时间不足3年，但在一些重大历史事件面前走在了时代最前列。1941年新华社的外文刊物《中国报道》，通过香港或其他途径发往外国，为国际社会了解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提供了平台。除报刊外，新华广播电台也成为该时期我们对外宣传的重要方式。

“请进来”：架设对外传播的直接平台。一方面，欢迎国际友人记录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情况。1936年，在宋庆龄的帮助下，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绕过重重封锁来到延安，对根据地的军队建设、经济建设等作了广泛调查。随后《密勒氏评论报》（美国报人在中国创办的一份时政类英文期刊）、英国《每日先驱报》、美国《星期六晚报》等多家报刊，先后发表了斯诺的30余篇通讯报道，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由这些报道汇编成的《红星照耀中国》问世后，更是一度轰动世界，称其与哥伦布对美洲的发现一样震撼世界。此后，有100余位国际友人来到延安，国际新闻界也掀起了报道中共的热潮：韩素音写了《早晨的洪流——毛泽东与中国革命》、海伦·斯诺写了《续西行漫记》、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写了《人类的五分之一》，等等。这些著作大量报道了八路军的敌后抗战情况，讴歌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战争，让世人更多地了解了红色中国。另一方面，邀请外国记者、军人等到延安和

根据地访问。陕甘宁边区被国民党军事封锁后，国际友人不能随意进入。对此，我们广泛开展外交活动，及时传递中共声音，邀请外国记者、军人等访问考察，就是其中的一条重要途径。例如，1944年2月，中共驻重庆办事处邀请《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等媒体的记者一行前往采访报道，向他们介绍中共抗战贡献，揭露国民党破坏国共合作的实际情况。再比如，1944年7月和8月，美军观察组分两批到达延安，中共方面专门组织有关人员向他们全面介绍了中共的方针政策和根据地建设情况以及敌后抗战形势，得到美方的高度认可。

延安时期我党做好国际传播的启示。党在延安时期的国际传播工作，不仅打破了国民党的封锁与污蔑，更是有效提升了国际形象，增强了中共在国际社会中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对加强和改进我国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颇有启迪。

第一，坚持主动出击。一段时期，在国民党的诋毁宣传下，“强占国土”“攻打国军”“阻碍抗战”“游而不击”等充斥报端。对此，我们不是采用“污蔑一回应一再污蔑一再回应”的应对方式，而是坚持塑造是更高层次维护的理念，主动出击，把对外宣传作为重要工作。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将扩大国际宣传和增加国际援助作为一项重要任务；1940年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对国内外的宣传应